



文章编号:1003-6121(2017)06-0100-04

“六十而耳顺”的释义

谭若丽

(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文学所,吉林 长春 130012)

[摘要] 历代学者对《论语》为政篇中“六十而耳顺”一句的注解多有不同,甚至差异巨大。将多种解释对照分析,得出此句中“耳”字乃传抄过程中的衍字,并在出土文献中找到相关资料,为此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

[关键词] 论语;存在;虚词;衍文

[中图分类号] H131

[文献标志码] A

《论语》为政篇有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之语,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简要总结。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将此句译为:“我十五岁,有志于学问;三十岁,(懂礼仪)说话做事都有把握;四十岁,(掌握了各种知识)不致迷惑;五十岁,得知天命;六十岁,一听别人言语,便可以分别真假,判明是非;到了七十岁,便随心所欲,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。”^{[1]12 13}在注释“耳顺”两字时,说:“这两个字很难讲,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,但都觉牵强。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。”

“耳顺”一词本为常用之语,为何很难解释?《论语》是语录体经典著作,自西汉起,历代学者对它不断进行注释和研究,且出现了诸多关乎《论语》注释的著作。如,古有魏晋何晏等撰有《论语集解》,宋朱熹作的《论语集注》;后有近人

程树德作的《论语集释》,杨树达作的《论语疏证》,杨伯峻作的《论语译注》等,由此形成了庞大完整的解读体系。翻阅现存《论语》相关的著作中对“六十而耳顺”的集解与注释,发现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“耳”这一字的有无及释义上。如:多数学者认为“耳”字在《论语》原文中是存在的,并从“耳”作为人体的感官器官的功能作用延展开来。

《论语集解》是由曹魏时期的名士何晏等采集孔安国、包咸、郑玄、马融、王肃、周生烈、陈群等汉魏名家古注编撰而成。此书所引诸家注解现皆已亡佚,今人无法再一睹其貌,故此书就成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《论语》注本。细读《论语集解》可窥见其成书的时代关于《论语》的理解与诠释,可以称为研究《论语》必不可缺的参考书。

《论语集解》此段引郑玄注曰:“耳顺,闻其

[收稿日期] 2017-06-07

[作者简介] 谭若丽(1984-),女,山东莱芜人,助理研究员,吉林大学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古典诗词、东北文学研究。





言而知其微旨也。”^{[2]15}是突出耳作为人的一个器官,搜集声音传递道理的重要功能性。此说影响极为深广,被后来很多学者所赞同或引用,如:北宋太宗时期礼部尚书邢昺所作《论语注疏》,清代“扬州学派”朴学大家刘宝楠所著《论语正义》等。今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——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论语注疏》采用的也是何晏的集解。

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延续了“耳”是指人的声感器官这一观点。他说:“声入心通,无所违逆,知之之至,不思而得也。”^{[3]54}即是说,耳是一个桥梁,它将外部声音与心灵意识相联通。近人程树德也是此观点的支持者,他撰写的《论语集释》是民国时期《论语》研究的重要著作。在凡例中,他明确标明,其书以何晏《论语集解》为主,兼附邢昺《注疏》作集解;辑录朱熹《集注》内注朱及宋以来相关注说作集注,采朱注以外之新说作别解,录载清儒阐发义理之说为余论,采陆、王一派义理之说为发明,可见其注解源流。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中“六十而耳顺”一句,亦录郑氏“耳顺,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。”的解释为主要观点,而对异于此意的韩愈之说不予采录,并接引南宋著名心学创始人陆九渊的高徒——“慈湖先生”杨简之语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解释:

“慈湖训语(驳异引):目之所见犹寡,耳之所接为多。暮夜无月无烛,目力所不及,而耳接其声。又自近而远,四方万里,目所不及,而言辞之所传,事物情状不胜其多。又自此而上,极之于远古简册之所载,言辞之所及,亦属乎间,

无不融然而一,旷然而释,怡然而顺。”^{[4]76}

“耳之所接”与“目之所见”结构对称,内容对应,突出耳目的器官功效,由外而内,感于外,而融于内。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,对“耳”的解释逐渐从其作为具体的感觉器官一说转化为赞扬其传道、阐释圣人的圣行圣德的作用上,有从物质实体转化为精神虚体的倾向。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此篇接引清代哲学家焦循所作《论语补疏》,谓:

“耳顺即舜之‘察而言’,所谓善与人同,乐取于人以为善也。顺者,不违也。舍己从人,故言入于耳,隐其恶,扬其善,无所违也。学者自是其学,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。圣人之道一以贯之,故耳顺也。”^{[4]76}

焦氏以善于倾听别人意见,且善于分析别人话语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舜的事例说明孔子此文。所谓“善与人同”,指的是能够乐于听取他人的意见,同时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。顺,即通达,不违逆,舍弃他人意见中的不合理成分,吸取他人意见中的合理成分,从而入耳顺心。这样,则无论听到什么话都能不违于耳,不逆于心,不斤斤计较,豁达通顺。为圣者能够自始至终贯彻这一原则,所以能入耳入心。

将“耳”顺与圣人圣德圣行相结合的观点由来已久。南朝时,梁儒家学者,同时也为经学家的皇侃所著《论语义疏》中,引三国魏王弼《论语释疑》云:“耳顺,言心识在闻前也。”引东晋著名文学家、文论家、目录学家李充的《论语注》曰:“耳顺者,听先王之发言,则知先王之德行。从帝王之则,莫逆于心,心与耳相从,故曰耳顺也。”引孙绰云:“耳顺者,废聪之理也。朗然自玄悟,不





复役而后得,所得‘不识不知,顺帝之则’”也,可见,三国两晋之时已有将自心明理融合儒家学说,从而引申至圣贤之言、圣贤之德之说。此说至今未衰。如,近人杨树达所著《论语疏证》用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《论衡·知实篇》为这种观点作合理性解释,称:“从知天命至耳顺,学就知明,成圣之验也。”杨树达按王之说曰:“王仲任(充)之说甚确。《说文》云:‘圣,通也,从耳,呈声。’耳顺所谓圣通也。盖孔子五十至六十之间,已入圣通之域,所谓声入心通也。此两句话解释为:孔子六十圣通,七十则由圣人神矣。”^[5-42]

对以上将“耳”作为实体器官,起传递圣人圣言作用的观点,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他认为,焦循所谓“言入于耳,隐其恶,扬其善,无所违也,此说尤误,孔子岂待六十方知隐恶扬善乎?”^[6-132]指出,孔子作为古代圣贤,聪敏早慧,其四十已不惑于物,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生观、价值观,对人情事理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,何必等到六十才知其“微旨”? (亦作“微指”。亦作“微指”。精深微妙的意旨。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叙:“究洞圣人之微指。”)此种说法存在逻辑上的漏洞。对于郑玄“耳顺,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。”马融“矩,法也。从心所欲无非法。”等美化圣儒先师之言,于省吾更是批驳其无所根据。

对韩愈《论语笔解》中不从耳顺之说,“‘耳’当为‘而’既知天命,又如此顺天也。”认为,“耳”字当为虚词“而”字,从而形成文章结构的对应,赞扬其“自具卓识”。于省吾欣赏韩氏不人云亦云,敢于创新,坚持己见的精神,却并不认同其观点。于先生依据多年对古文字的研究认知,

从语句语义方面对此段文字进行分析,认为“耳”字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衍字,在文句中并无实际意义。他在《论语新证》一文中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。同时推论,既然汉代时期已经有了“耳”字在此文中的记载,那么此字衍生的时期应该追溯到秦汉之际。秦汉时期的儒学之士,传授经文,解读经典,增加或删除文字的情况很常见,此句“或以下言心而上增耳字,或以而与耳声韵相同,因之误衍。”并援引冯登府的《论语异文考证》为证:

“此十四字应作四句读,六十而顺,七十而从,心所欲,不逾矩。从犹顺也,散文则通,对文则从之义加于顺。下二句系阐述上二句顺从之义,且以结束全章。其本旨违凡心所欲,不勉而中,至六十、七十则一任自然,无所不合。古籍每以顺、从为言,《易·颐》六五象传‘顺以从上也。’《易·革》上六象传‘顺以从君也。’是顺从相属为词之证。《庄子·寓言》‘二年而从,三年而通。’与六十而顺七十而从之语例相仿。于是从文章的语义理解上“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发端,以心所欲不逾矩(矩指法则言之)为收束,中间无涉于耳闻之事。且四十而不惑,是就接触外界事物而不迷惑为言,其语意已重于耳顺,岂待六十始能耳顺乎。”^[6]

面对众说纷纭的观点,应该如何选择才能正确理解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的含义呢?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成为经典,原因不外乎:或是文学作品本身或具有抑扬顿挫的节奏韵律便于传唱;或乃是浑然天成的绝妙好辞予人陶醉;或具





有醍醐灌顶的经验智慧给人启迪等。《论语》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,语言简练,含义深刻,句式整齐,节奏鲜明是历来公认的特色。就此句来看,“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”与“七十而从心所欲”皆是数字加动词或动宾短语的形式,“六十而耳顺”位于二者之间,其结构不可能大变,“顺”已经承担了动词的作用,“耳”字的存在显然打破了语言形式的统一。从语义上来说,作为圣人的孔子,四十、五十之时已能分辨是非不迷惑,明白世间规律;六十之时则应是对世情有更深一步的认识,不可能又折返到外部器官“耳”顺的低级层次。因此,从语句结构和逻辑意义上分析,“耳”字为虚词和衍词的可能性更大。又由于“六十而耳顺”中已有“而”字,“耳”只能判定为衍词。

此外,本文作上述结论,并非是一厢情愿的推测,而是有文献可供佐证:程石泉在《论语读训》中根据陈铁凡《敦煌本论语异文汇考》提到的敦煌残简编号 S. 4696, G. 7089, V. 568, 其内

容为“六十如顺”(《为政》)乃何晏《集解》之残卷,此一发现意义重大。此《敦煌残卷》无“耳”字;又“而”字作“如”字。同时引用王引之在《经传释词》中谓:“如犹而也。”同时本号《敦煌残卷》中有“譬而北辰”,而今本《论语》作“譬如北辰”。可见,唐人于“如”字及“而”字是不加以区别的。^{[7][1]}

出土文献为“六十而耳顺”中的“耳”字是《论语》在传抄中而衍生出来的提供了实证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杨伯峻. 论语译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[2][魏]何晏. 论语集解[M]. 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7.
- [3][宋]朱熹. 论语集注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4]程树德. 论语集释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5]杨树达. 论语疏证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6]于省吾. 论语新证[J]. 社会科学战线,1980(4):132.
- [7]程石泉. 论语读训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.

[责任编辑]李献英

"The Definition of Sixty and Earthen"

TAN Ruo-li

(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Changchun, Jilin 130012, China)

Abstract: the scholars of the "Analects of Confucius"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ear sixty sentence annotations are different, even a huge difference.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a variety of comparative analysis, the sentence is made in the process of derivative words, and found in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and related material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is view.

Keywords: Analects of Confucius; exist; function word; redundancy of words

